

文学史书写如何融合 整体性、地方性与个人性

——读张炯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

□张丽军 姚乐旗

张炯先生生于1930年代，如今已逾耄耋之年，却仍秉持着“勤奋刻苦，严谨治学”的学术姿态，笔耕不辍，文思敏捷，可谓学界的一棵“常青树”，是吾辈的楷模。他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是学界中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听之者无不啧啧称叹。从参加革命的游击队战士，到入伍再求学的北大才子，再到知名学者和蜚声文坛的名家……多重身份下的张炯，不仅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更有着无比丰厚的文学经验和治学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也共同构筑了他编写和研究文学史的宽广精神视域和独特审美体验。《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煌煌80多万字，是张炯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与之前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共和国文学六十年》等文学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承袭了他既遵循学术传统，又兼顾发挥个人审美力和判断力的撰写风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新著更加突出了其对文学史编纂的新思考，借鉴吸收了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等概念，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意识，也关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区域特色，同时表达出了个人独到的学术见解、专长与审美趣味。此种将多种视野有机融合的撰写思路，无疑对“重写文学史”以来的文学史编纂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总体化思维与“经典”意识

首先，该著以宏观的通史意识，总体性地观照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发展，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张炯依据“现代中国”历时性的现代化变迁，把现当代小说划分为态势不同的四个历史阶段：1911年到1930年是新小说的发轫阶段；1930年到1949年是现代小说蓬勃萌发的阶段；1949年到1977年是我国小说曲折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是新中国小说空前繁荣的阶段。此种划分方法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宏观发展脉络及其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代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次，不仅在宏观的时间维度上，该著体现出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在对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也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的实践，试图对左翼文学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文学思想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思考路径与解读方式都对之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研究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遮蔽了文学及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和评判难免流于表面化。而张炯坚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左翼文学，既肯定了其在开辟新的题材，描写新的人物，表现更加民族化、大众化的新的形式和风格上对新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贡献，也客观地对其存



《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下），张炯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6月

在的简单概念化、公式化等弊病予以批评。

最后，与其他文学史著作以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为叙述重心相比，该著则更加侧重于作家作品，有着强烈的“经典意识”，尤其显示出了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尤其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学界热议的一大问题，也是颇具争议的一大难题。该著的目录清楚地罗列出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在当代文学史部分，张炯重点介绍了第一届（1977-1981）到第十届（2015-2018）“茅盾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堪称该著的一大特色。“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国家级最高奖项之一，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意义非凡。张炯从大的视野出发，强调了“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中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应，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激励和引领作用。

对地域与民族风情叙事的关注

在空间维度上，该著下编立足于文学地理学，专门深入探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地域与民族风情特征，这是该著的又一大创新之处。张炯分析了京、津、沪、晋冀、齐鲁、岭南等各文化区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展现了地域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生动阐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小说各呈现出的独特风情和文化底蕴。这部分论述视角全面而多元，作者对各文化区优秀的作家作品如数家珍，这也显露出了张炯深厚的文学研究素养。

除了对地域风情的关注，张炯也着重探讨了民族风情叙事在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他通过分析作品中民族文化、民间传说、民俗习惯等元素的运用，探讨了作家们如何在作品中展现独特的民族特色，或如何通过刻画民族风情来丰富作品的内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文学世界。而对少数民族小说、边地小说的特别关注，也弥补了其他文学史著作在此研究上的不足。

厚重的历史和沸腾的当下

——评戴劲松的报告文学《空中出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花湖实践》

□周新民

鄂州花湖机场是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航空货运枢纽，是“空中丝绸之路”之路的重要节点。机场从选址、建设到校飞，体现了小城鄂州欲火涅槃的历程。花湖机场的建设历程是鄂州蝶变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国发展、腾飞的切片。戴劲松的报告文学《空中出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花湖实践》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鄂州花湖机场建设的历史，体现了新时代文学的诸多特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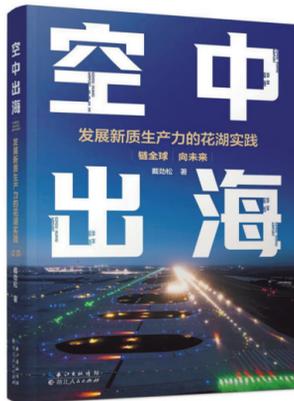
文学题材的特性、功能与价值，一直是批评界的热门论题。曾有一段时间，当代文学提倡重大题材，甚至还出现过“题材至上”的观点。也有批评家并不看重文学作品的题材，倡导题材无差别论。在他们眼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两者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之所以出现争论，是因为没有区分清楚文学的功能与题材之间的关系。文学功能不同，对文学题材的诉求自然有差异。正常的文学生态需要多种多样的题材，这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然需要。我们不能一味推崇重大题材而摒弃题材的多样性，但文学作品的题材和价值之间的关联性还是值得我们注意。新时代文学要引导读者去认识社会和现实。近几年一些文学作品重新召回现实题材，特别是重大题材，提升了文学作品反映时代、表现社会生活的能力。《空中出海》实际上也是这一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作品。

花湖机场坐落在毗邻武汉的鄂州市。这是一个内陆小城。建设花湖机场，预示着中国经济向内陆腹地不断延伸的发展趋势。《空中出海》详细叙述了鄂州机场选址、审批、腾地、开工、克难、启航、布局等历史过程。作品着力抒写机场建设

过程中的独特精神——“挑战不可能”。

鄂州毗邻武汉，原本是黄冈地区下辖鄂城县，于1983年独立建制为地级市。从地理位置上讲，鄂州并无优势，夹在历史文化名城黄冈市和省会武汉之间。鄂州虽然是地级市建制，但空间和人口仅有县域规模。地理和人口资源上的限制，使得鄂州的发展一直不见起色。但鄂州的历史悠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区位并不优越，历史悠远、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市，如何在迅猛发展的时代腾飞呢？诸多条件处于劣势的鄂州，要建设机场本是一件不可能之事，如何让这件不可能之事最终成为可能，成为现实，是《空中出海》展开叙述的基本路径。这种切入事件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一般报告文学流于琐碎或流水账的流弊，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围绕战胜困难来组织事件，使《空中出海》充满了紧张的内蕴力量。对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发掘，让作品回归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时代共振。

《空中出海》以“挑战不可能”精神的书写为主导，以此作为凝聚人物形象的纽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空中出海》要写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同时，《空中出海》要写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这样的写作使《空中出海》摆脱了为某个具体人物树碑立传的可能性。《空中出海》所涉及的人物既有大型企业老总，也有党委、政府的领导，更有许多普通办事员。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那些普通大众，尤其是那些搬离家园、那些为了机场建设而作出重大牺牲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也在挑战文化传统的羁绊、挑战对于故土难离的情感依



《空中出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花湖实践》，戴劲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恋。总之，“挑战不可能”的精神书写作为贯穿《空中出海》的主线，既呼应了时代精神，也使它超越了一般报告文学叙事、写人的陈规。

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性、宏阔的视野和为历史发声等特征。就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而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改革开放发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潮流。近些年反映脱贫攻坚、反映重大现实报告文学频繁地走进人们的视野。《空中出海》顺应这一趋势，从厚重的历史和沸腾的当下中间，找到了融合的言说空间。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

地理环境是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存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从前，地域环境是先验的存在，个人唯有适应与臣服，所以我们总是操着方言土语来白描地方风物、记录民俗人情，用温情脉脉的口吻来想象或是追忆那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现如今，我们已然认识到，人与所处的地理空间之间已经是一种相互改变、彼此成就的关系：人被所处的地理空间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其思维方式、情感想象，以及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所采取的价值呈现方式等无一不在提醒着他（她）的来处；而这些地理空间也在时间的酿造下变成了“人化”的文化空间，它已不仅仅是一砖一瓦、一寨一堡，而成了个体对这个熟悉空间的诸多情感与想象的总和。

王选的散文集《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就是这一类具有“恋地情结”的在地性书写，他用传统的节气“端午记”“夏至记”“中秋记”“冬至记”“立春记”“清明记”来为自己的记忆分门别类：他的依恋与不舍，他的惆怅与落寞，连带着他的困惑与迷茫。那个名叫西秦岭麦村的故乡，不再只是地理版图上的那个出生和成长地，更是一个回不去的复杂情感时空。作者在对待故乡的过去与现在上，毫不掩饰地呈现出两幅笔墨：对于记忆里的故乡，他的笔触是如此的深情款款，把贫瘠困难的岁月都渲染出了诗情画意的色彩，他以浪漫化的笔调来写童年的牲口、山野的飘与乡村的月色，在无限的眷恋下流露出隐晦的哀伤，“那些熟悉的物件，似乎要扑过来，抱紧我，忍不住号啕一场”；而对于当下的故乡，他既看到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痛心疾首地描绘了在城市化进程下的边缘处境场景，引申出“乡村如何发展？它将走向哪里？”的思索。

面对“现如今，我们该如何想象与书写乡土”这样的“大哉问”，王选的答案显然是极为“拧巴”的，正如同这组散文的标题“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他是矛盾的、别扭的、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的。虽然他的行文清晰地呈现出师法沈从文的痕迹，但在同样的怀旧病面前，他无法实现情感上的舒展，反而以一种较劲的姿态在与自己反复辩论：和过去较劲，和自己较劲，和城市较劲，和传统较劲，也无可阻挡的未来较劲，所以，他一边反复强调“一个人走遍了一方，割不掉的还是故土”“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民”，一边又自认为是故乡的“叛徒”“麦村的过客”。他的这种“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到故乡”的感受，既有着沈从文用“乡下人”来抗议现代文明的痕迹，也有着路遥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下的挣扎，但更多的，是他敏锐地感受到却又无法应对的复杂现实变化，及其城市化进程下的疏离感，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孤独感。但恰是这一份尚不知该如何自处的拧巴劲成全了他的写作。这不仅成了他书写这片土地的源泉，也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乡恋写作的水分岭。一方面，他以一种召唤式的情感冲动来重返故乡，挖掘出那个有情的空间和有情历史，可以说，这是一段精神史或心灵史式的写作。只是，不同于《乡村笔记》《出梁庄记》这样深邃而冷静的知识分子书写，他的视角更为温热而潮湿。另一方面，他敏锐地觉察到人与地的关系已在当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的“无土时代”，其所带给人的混沌、模糊、分裂与不确定性的感受取代了温暖、怅惘但单一的乡恋，而能够与之对抗的，唯有对那一片故土在记忆、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复合型书写。

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伦敦传》中写道：“过去的遗迹变成当下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下去”，这不仅是指物质性的遗迹，也包括情感与心灵上的遗迹，过去和现在，以及那个微茫的未来，它们彼此缠绕、相互纠缠，使得故乡人的记忆也交叠了异乡人的感受。在王选的恋地书写中，这种发自恋地、源于无土的痛苦混合着带有泥土与牲口气味的文字，笼罩在读者的心灵上，提醒着我们有关土地、有关情感、有关我们从哪里来、又向何方去的追问。（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抒写别一番的“乡愁”

——简评徐春芳的诗歌创作

□王亚鸿

认识徐春芳，是在8年前的一个春日，我读到她的一组长诗《娇女哀歌》，诗歌中流露出的深厚且细腻的爱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写诗。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他曾担任过两届“江南诗社”社长。岁月如歌，他不再是那个坐在月光下写情诗的青年，却一直是一个醒着做梦的诗人。徐春芳陆续出版了三部诗集《雅歌》《颂歌》和《江南》，渗透了他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亦有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探索。

徐春芳坚持写诗30多年，源于他对诗歌强烈而真挚的爱。他以诗人的高度自觉，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并结合当下的现实积极探索现代技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积极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诗风，在中外诗歌时空交错的美丽碰撞中，他试图点亮自己的诗歌星空。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雾里看花的迷离意境，将诗歌形式的美与思想感情的表现结合起来。徐春芳写了很多爱情诗，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将古典意象进行现代转化。比如《温柔的讲述》一诗中写道：“最美的语言，烧红了身体里的杜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意象，诸如“月亮”“桂花”“杜鹃”等都关涉爱情、游子思妇、闺人思夫等情感。这些意象在表达男女情感时，大多含有内敛、素净之情，而徐春芳擅长采撷古典意象，赋予现代情感，给人以无限想象。

面对故乡，诗人总是容易产生一种乡愁。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乡愁作为对逝去时光、远去的人与物的留恋，当然主要是朝向过去，但同时也是面向未来。徐春芳笔下的乡愁是立体的：“秋风吹了，秋水很凉/泊湖掀起了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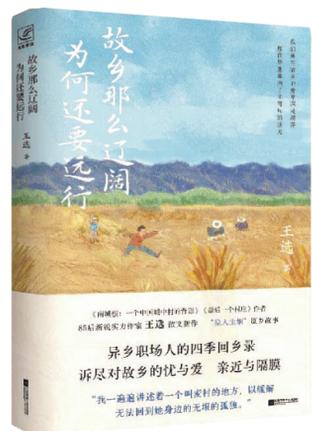
大浪/我的手轻轻抚摸故乡/地的皱纹雕刻着惆怅。”泊湖是诗人家乡的河流，铭刻着少年的心事。诗中提到的“她”，可能是母亲、姐姐，抑或是面目模糊的“她”。每一次回望故乡，都是对亲人和青春的回眸与眷恋。故乡的温柔留在诗人的青春里，诗人已踏入中年的齿轮，往事像疯涨的青草淹没脚背，“人生的图案上，涂抹了/太多的遗憾和偶然”。流动的现性和不断普遍的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文化乡愁。徐春芳笔下的怀乡曲，用灵活的“语言实验”托物言志，烘托出情感割裂的疼痛感、怀旧感和孤独感。

好的文字仿佛历经千年的青铜，沉淀岁月的痕迹，坚硬而有力，透露出一种深沉而悠远的美感，如古老的钟声在耳边回荡，让人沉醉。词语盛宴的终极目的是呼唤灵魂。徐春芳不满足于仅仅客观地描述现实，更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纯粹由诗歌语言构成的境界。这源于诗人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更是出自灵魂的真挚表达。他运用不同的节奏、韵律和布局来构建诗歌，使得诗歌在结构上既有变化又有内在的逻辑性。他还擅长用蒙太奇和乌托邦的描述方式呈现诗意现场，带给读者以新鲜的阅读感受。

诗歌创作是一群人的热闹，更是一个人的寂寞。从某种程度上说，诗人需要保持一种精神修炼的方式不断前行。徐春芳以诗歌为竹杖和芒鞋，不断去感悟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希望他写出更多更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优秀诗作。（作者系安徽青年诗人）

无土时代的恋地书写

□戴晴



《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王选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